

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容、逻辑及其新时代启示

李 龙¹, 侯文韬², 刘帅兵¹

(1. 南京体育学院 武术与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4; 2.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 民国武化运动是一场针对民国危局寻找中华民族出路的运动, 是相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的。其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时代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容、逻辑及其新时代启示展开研究。研究认为, 民国武化运动主要通过改造军人群体、提倡军事教育和体育救国及武术救国等内容, 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尚武精神。救亡图存是其应激性反应的外在逻辑, 强种强国是其内在的正向逻辑。其弘扬体育和武术的内在逻辑就是强国必要强种, 强种必要习武, 习武必要塑造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人格。这些逻辑思想光芒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是加强武化教育, 建设一支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军队; 通过武化教育, 培养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增强价值认同, 弘扬体育和武术文化的强身健体和教育功能。

【关键词】: 民国武化运动; 体育救国; 救亡图存; 强种强国; 尚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K258;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2)04-0051-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0607.001

历史隐藏着过去, 昭示着现在与未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外部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 内部社会动荡, 内外交困的局势迫使国人不得不思考国家、民族的出路, “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的时代问题, 摆在了每一个有骨气、有志气、有底气的国人面前。面对这一重大的时代之问, 有识之士纷纷开出自己的良方。就文化角度而言, 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 如胡适、陈序经等; 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改良, 如梁漱溟的著名论断“老树发新芽”; 当然, 还有文化折中调和主义者, 主张走中西结合道路。最终,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带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可以说, 一部民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动荡的历史, 一部民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历史, 一部民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拉开民国历史的帷幕, 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时局困难面前不屈不挠、刚正不阿、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勇往直前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面临两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当下, 尤其具有重大的实践要义。这是本研究考察民国以培育和弘扬尚武精神为核心的武化运动的

缘起, 通过对武化运动内容的梳理, 探究武化运动的逻辑及其新时代启示,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1 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容

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比较特殊的时期, 既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又开启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征程; 既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 又不得不面对国内的军阀割据、混战。西方列强的侵略让国人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进而意识到“强权之世, 非尚武不足以立国, 非铁血不足以生存”^[1]。相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 一场“新武化运动”开始兴起。其本质就是通过改造军人群体、提倡军事教育和体育救国及武术救国等基本内容, 分别在军队、学校和社会层面上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其核心价值取向就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收稿日期: 2022-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108)。

作者简介: 李 龙(1970—), 男, 江苏东海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哲学。

1.1 改造军人群体

武化运动兴起之初是以反对军人专政为内容的军人改造运动。五四运动后,国人对军阀问题的讨论和批判达到顶点,“反军阀”成为当时全国的新思潮。1922年,《努力周报》刊载了署名为LH的“武化运动”一文,最早提出了实行武化运动的倡议。该文认为,应通过武化运动打造一支属于平民的新军队,并提出建议:一是,对高等专门学校及以上的毕业生进行军事训练,以编成模范军;二是,在现有军队中选拔纪律严明的军队,编成正式的国民军;三是,将高等专门学校及以上毕业生分配到各处军队,对旧有军队进行知识上的改造^[2]。同年,武术界亦出现实行“武化”的倡议。张浦泉在《武术于国家之关系》中指出,重文轻武之陋习导致国衰民弱及“东亚病夫”之称号,“提倡新文化不如提倡新武化”“提倡武化,实为救国强身之要图。”^[3]德国留学生张富岁也提出“兵士教育化”,他认为“国民轻视当兵的心理一日不改,民族复兴的奋斗便要遇着若干的阻碍。因此要改变国民轻视兵士的观念,首先就必须在现役的军人身上想办法,使得他们能作国民的模范!”^[4]改造军人群体是当时武化运动较早聚焦的内容。

1.2 提倡军事教育

军国民教育是清末的外来产物。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5],其主要目的为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之需,对内反对军阀强权的政治所需。1925年,“五卅惨案”让国人认识到“欲实行全民革命,则非先求全民武装不可;欲求全民武装,则非先于学校实施军事教育不可”^[6],也促使武化运动精英们开始审视军国民教育的军事教育价值。

中国青年党领袖李璜首先提出,要塑造青年学生“整齐严肃(在日常习惯上),忠勇弘毅(在内心修养上)”^[7]的尚武精神。鲁继指出,要在“各级教育中,尤以师范教育之武化为最易收效于将来,而以中学教育之武化最易普及于全国。”^[8]除学校开展武化运动外,还要重视以艺术家、经济家、军事家、科学家等社会人士配合的间接武化教育,二者相互结合则“十年可望全国皆兵”^[8]。

武化运动精英们对学校军事教育价值的倡导,为国民政府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和战争动员活动奠定

了思想舆论基础。自此,学校国防教育迅速发展,学校军事教育逐渐规范化、系统化,进而成为独立于体育科目之外的学校教育科目。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提出“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9];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学校应实施军事训练案》;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及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并其他高中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作为必修科目,其修习时间均定二年。”^[10]显然,将国防教育正式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是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张治中在论述武化运动合理性时指出:“中国武化,决不会变成黷武主义,仅仅出自自卫的要求。”^[11]丘汉兴在《武化运动发端》中强调,武化运动目标是“铲除中国萎靡怯懦、死气沉沉的病根,强身健神,救国保种”^[12]。可见,武化运动注重军事教育的目的在于改变“重文轻武”的旧传统习俗,使军人的精神在国防教育和净化社会道德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培育和弘扬尚武精神。

1.3 提倡体育救国、武术救国

体育救国思想之所以成为武化运动的内容,主要是基于抗日战争的时局而产生的。面对中华民族危局,武化运动精英们主张体育救国。他们的强烈意愿就是体育军事化,救亡图存,体育为国家、体育为民族。郝更生^[13]认为,“国人鉴于国难严重,非积极图强,不足以自存,惟救亡图存之道,固属经纬万端,而行健自强,体育实为至要。”程登科^[14]认为,“近年来,为了这许多弱肉强食的事实,我执政诸公,教育当局,莫不以涤雪国耻为休,以谋强种健全的捷径,而体育便被认为是健民强国的唯一的重要工具。”萧忠国^[15]提出,战时国民体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战斗精神,提高民族意识……力求国术体育与军事融会贯通,互为体用”。体育救国思想旨在通过体育军事化、民族化,增强国人体质,培育尚武精神,救亡图存。时势使然,体育救国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面对西方体育文化东渐……‘国术救国’等口号,成为时人重新定位中华传统武术价值的‘座右铭’。”^[16]尤其是“社会精英认识到武术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

教育价值。”^[17]武术承载着“强种救国之道”。1928年,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张之江提出“文化即国学,武化即国术”^[18]的观点。他强调,“历考我国积弱的缺点,就误在重文轻武这四个字上,把堂堂的国民,几乎全变成了病汉”^[18]“要注重与国同生死的武化,就赶快来练习国术,强种才能强国”^[19]。他提出“武术救国”的口号,“我们现在要以国术来强种,要以国术来救国”^[20]“国难危机,兴亡有责,凡我同胞,分当救国,救之以道,任侠尚武,发挥国宝,拳勇技击。”^[21]万籟声^[22]认为,日本在“兵士不如俄之多”“炮火不如俄之精”的条件下战胜强俄,并以“海岛弹丸之区”跻身强国行列,根本原因在于其“自我窃去柔术之功”,故能在最后5 min“枪炮无所施其技,飞机炸弹亦无所用其威”时,以血肉相搏而取胜。因而,他主张应在成立学校武术队、设立学界武术研究会、聘请优秀教员等方面加强武术建设。

在时局和武化运动精英们的推动下,武术开始受到国人重视,成为武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成为强种强国的重要手段,更是培育和弘扬尚武精神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于是,各种武术组织相继成立。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武术组织有精武体育会、北京体育研究社和中央国术馆等。

1.3.1 精武体育会及其武术活动

1909年,霍元甲在上海闸北王家宅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学校”。1916年,“中国精武体操学校”迁入新址,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其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23]精武体育会对民国时期武术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武术活动主要特点是:第一,兼收并蓄,会通中西。精武体育会把西方体育作为武术技术训练的辅助手段予以吸收。如习练足球以纠正会员练武时“步舞不稳,跳跃不捷”的问题。第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精武体育会推广武术的形式灵活而活泼,经常举办运动会、游艺、表演等活动,兼具教育性、表演性和娱乐性;同时,还创编滑稽舞、剑舞、武化舞、凤舞等。第三,开展武术拳谱的编著、配图及出版工作。精武体育会陆续编成并出版了包括功力拳、潭腿精义等数十种书籍在内的武库丛书。同时还借助影片形式进行武术宣传。根据《精武会五十年》所载目录显示,精武影片共计5卷66部。第四,广建分

会,注重国际传播。精武体育会1910至1920年间是在国内建会,1920年后开始着手建立海外分会。据不完全统计,到1929年,精武体育会已有42个分会,总会员数逾40万。

1.3.2 北京体育研究社及其武术活动

北京体育研究社隶属民间组织,1912年由许禹生与北京的多位武术名家共同创办。其宗旨为“普及武术运动,研究武术理论和拳史,培养武术人才,达到强国保民”,1919年开始随着工作重心由“提倡国民体育活动”转变到“研究体育学术”,其宗旨改为“研究体育,振兴尚武精神”^[24]。

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武术活动主要特点是:第一,推动武术进校园。1915年4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北京体育研究社《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决案。该议案建议:①拟请学校体操课内兼授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必修课以振起尚武精神;②拟请教授武术者编订讲义,说明原理,用科学的眼光唤起学生注意;③拟请师范学校内将中国旧有武术列为主课,以裕师资。1915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纳了上述建议,指示“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25]。第二,培养武术师资。1916年,成立北京体育讲习所作为北京体育研究社的附设机构,“以培养大中小学校学生之武术师资力量为准绳”^[26],并于1919年更名为“北京体育学校”,以“养成完全体育师资”为宗旨,修业年限3年,毕业后充当各级体育学校教员。第三,促进武术社会化。北京体育研究社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面向不同人群开设了高级国术训练班、国术专修班、公务员星期日国术研究组、儿童国术练习班国术幼年班等。为了取得规模化的教学效果,扩大武术的受众人群,北京体育研究社对武术套路的结构进行了删繁就简的改造和重编。总之,北京体育研究社将原来流传、散落在民间的武术开始正式成为学校教育内容,对武术学校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3.3 中央国术馆及其活动

1927年,张之江积极联络蔡元培、李烈钧、冯玉祥、孔祥熙等26名国民党党政要员,发起建立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的备案(第一百七十四号公文),在1928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四十一期上予以刊载。批文云:“吾国技击诸法,渊源久远,传

习寝微。设馆研究,具见提倡精神,裨益青年体育。查阅(国术研究馆)简章亦尚妥协,应准备案。”^[27] 1928年3月24日,在南京内桥金陵大舞台召开国术研究馆成立大会。1928年6月,将其改名为中央国术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国术馆迁出南京,经桂林、长沙、昆明,1941年到重庆,1946年迁回南京,1948年宣告解散。

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活动主要特点是:第一,打练结合。张之江认为武术教育不能割裂“势势相承”的套路演练与“两两相当”的技击对抗,否则就如同旧时沽衣店里的旧衣物无法配套,就算勉强强行拼凑也经不起考究和推敲^[28]。因而,学员们既要练套路,又要习技击。第二,练修并重。张之江^[29]认为,“术学兼备缺一不可”“练修并重,练是关于体质外表一方面的,修是关于精神灵性一方面的,关于练的方面固然是要专心致志,如果只练而不修,那就没有道德,没有精神,没有保障,将难免为非作歹,误入歧途,危害社会”。中央国术馆通过“打”“练”整体观地推进,将“术”“学”结合,“练”“修”结合,进而培育学生兼具“文明的脑筋”“高尚的思想”和“雄强的体魄”^[29]。这是中央国术馆武术活动比较突出的特点。

总之,民国时期,在西方体育影响下,这些武术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武术教育的地域家族界限,武术教育的方式、方法、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武术进入学校,以及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育活动,改变了武术过去以家族、师徒或秘密结社为主的传承方式,转而以班级授课制形式进行教育,使师徒关系逐渐向师生关系转变,开启了武术发展的新篇章。

2 民国武化运动的逻辑

通过上述武化运动内容清晰地折射出尚武精神寓于武化运动之中,武化运动是尚武精神的重要载体。然而,促使武化运动产生、发展的逻辑又是什么呢?笔者研究认为,民国武化运动的产生、发展主要有两大逻辑,分别是救亡图存的外在逻辑和强种强国的内在逻辑。这两种逻辑有机地支配着武化运动的产生、发展。

2.1 救亡图存:民国武化运动的外在逻辑

民国历史是接续鸦片战争中国开始衰败的历史

续写的。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受尽了凌辱,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表1),将中国一步步地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毛泽东认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的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们,都打过我们。”^[30]

面对凋零残败的外部危局,有识之士都在试图寻找中国的出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试图从物质技术、社会制度、文化层面改良,进而强大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但是转瞬间又被封建遗老们窃取了胜利果实。随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直到北伐战争取得胜利,才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开始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最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由此可见,自鸦片战争至民国结束这段时期,中国动荡不安的时局让中国人民受尽了凌辱。为此,武化运动精英们开始反思以寻求破解之法。于是,救亡图存的武化运动便应时而生,应运而生。按照生物学上的应激反应学说,救亡图存的武化运动就是国人面对岌岌可危的时局刺激,作出的应激性反应。质言之,救亡图存是推动武化运动发展的外在逻辑。

2.2 强种强国: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在逻辑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及把握民国武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同样需要自鸦片战争开始厘清。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没落的晚清政府在与帝国列强的战争中是屡战屡败、割地赔款,西方列强开始嘲笑、讥讽中国。在他们眼里,中国是病入膏肓的病夫,不堪一击,给中国人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尤其是日本对华的侵略,严重挫伤了国人的民族情感。然而,现实是残酷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1931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凶猛,意图殖民中国。日本的崛起,让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和武士道精神,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蒋方震曾言:“彼日本崛起于数十年之间,今且

表1 中国近代部分不平等条约简表
Tab.1 A brief table of some unequal treaties in modern China

时间/年	条约名称	主要内容
1842	中英《南京条约》	赔款2 100万两;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共协关税。
1844	中美《望厦条约》	取得《中英南京条约》特权;扩大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规定;美舰可出入通商口岸,美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
1858	中俄《爱珲条约》	沙俄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km ² 土地;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km ² 领土归两国共管。
1858	中俄《天津条约》	沙俄获陆路通商和沿海口岸通商权利,取得在通商口岸停泊军舰、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
1858	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汉口等10处通商口岸;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在内地游历经商。外国商船和军舰在长江口岸自由航行。偿英法军费各白银200万两,赔偿英商损失白银200万两。
1860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尖沙嘴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到800万两。
1860	中俄《北京条约》	沙俄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km ² 领土。
1864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沙俄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44万km ² 领土。
1874	《北京专条》	清政府以白银50万两作为日军撤出台湾的条件。
1881	中俄《伊犁条约》	中国收回伊犁,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割给俄国;赔款900万卢布;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贸易不纳税,货物运至嘉峪关减税1/3。
1895	中日《马关条约》	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1901	《辛丑条约》	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保证严禁民间反帝活动;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帝国主义国家驻兵京津以及京山铁路沿线;划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

战胜世界强国俄罗斯,为全球人所瞩目,而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固有之武士道。”^[31]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1917年)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中国“国力茶弱”,根本就在于“武风不振”^[32]。

于是,武化运动为中国开出良方:强种强国。严复认为,民众的体质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至于近世,则欧罗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33]。他倡导“鼓民力”,以“壮佼长大”的强健体魄和“骁猛坚毅”的勇敢精神,改造“东亚病夫”的羸弱体质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梁启超则提出“新民”尚武思想,强调“体力”“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34]孙中山指出:“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以弱国为问题。倘以平和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不待他人解决。”^[35]他

将“尚武精神”视为救国的一种手段,通过“强种”来达到“强国”的目的。张之江明确指出:“要注重与国同生死的武化,就赶快来练习国术,强种才能强国。”^[19]

可见,武化运动的内在逻辑就是强种强国。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军事体育化、体育军事化、国术军事化成为当时武化运动的主要路径。无论是在军队、学校,还是在社会大众层面,其目的就是强种,提升尚武精神,保卫国家。

3 启示

3.1 加强武化教育,建设一支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军队

民国武化运动告诉我们,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缺乏尚武精神是一种灾难。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如宋朝都城从汴梁到杭州的南迁进程就是一部尚武精神衰败的历史,就是一部耻辱史,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军俘虏(史称靖康之耻)。民国武化运动和宋朝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了最有力的

注脚,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家、民族,必然是受到霸凌的国家、民族,一个强大的国家、民族必然不能缺乏尚武精神。

军队是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尚武精神应是军人现代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人文之魂。国防大学教授戴旭^[36]认为:“尚武精神的缺失是近代中国悲剧的民族总根源。”回眸民国历史,尚武精神的有无曾在军队的战斗力和整体状态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并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同样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由于缺乏必要的尚武精神,使日本侵略者以极其轻微的代价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也使“九一八”事件成为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忘怀的耻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平型关战斗、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战役中,具备尚武精神的中国军队勇猛善战,不惧生死,不畏强敌,最终击溃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历史表明,尚武精神是军队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的强大精神保障。

民国武化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新时代打造一支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军队不仅是实现国家安全和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需要,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需要和重要保障,还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要和重要保障。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既要坚持科技强军,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要加强人文强军,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打造坚不可摧的精神脊梁和奋勇向前、英勇斗争、不惧生死的牺牲精神。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强调并阐述其强军思想,无论是传承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优秀战斗品质,还是提升与振兴当代革命军人的“血性胆魄”“精气神”,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37],强军思想都寓意一个科技强军和人文强军的伟大主题。科技强军就是用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武装军队,人文强军就是建设一支具有尚武精神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

3.2 通过武化教育,培养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

青年强则国家强,只有强种才能强国。因此,加强武化教育,培养青少年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精神

品质,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职责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38]是习近平对青年人的热切厚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保证。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上某些不良文化、畸形审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当代青年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的诸多问题开始凸显。民国历史已经清晰而深刻地昭示:青年群体的精神风貌和血性品质关乎一个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兴衰。

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就我国青年群体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白皮书专门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精神风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正是中国青年的觉醒“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光”^[39]。这提示我们,培育青年胸怀全局、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使他们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已然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

3.3 增强价值认同,弘扬体育和武术文化的强身健体和教育功能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体育救国、武术救国都是民国武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都将体育和武术作为强种强国、振兴国人尚武精神的重要手段。它们之所以得到国人认可并发挥时代作用,关键在于它们最大程度地渗透、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价值在国人的实践中得到了认可,认可后又大力提倡,形成良性发展态势,继而避免“体育救国和武术救国”沦为虚浮而空洞的口号或宣教。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增强为国争光能力”“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40]等战略任务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的颁布与实施,都给体育和武术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如何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是当前体育界和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历史昭示着未来。民国武化运动的体育救国和

武术救国所揭示的深刻道理,给新时代弘扬体育和武术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时代体育和武术文化的发展,要立足于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增强人们对体育和武术的价值认同,为人们提供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强身健体的体育和武术运动方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有机部分,发挥体育和武术的强身健体与教育价值,积极引导人们走向体育健身、习武强身、报效国家的自觉。在实践操作层面,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校园体育,发挥体育和武术对青少年强身健体和教育的功能;二是,体武携手、体卫融合、武医融合,融入全民健身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和提升国民体质及健康水平,助推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4 结语

面对民国时期风雨飘摇的时局,武化运动精英们发起武化运动的外在逻辑是救亡图存,内在逻辑是强种强国,进而培育和弘扬尚武精神。强国就要强种是民国武化运动的正向逻辑。体育和武术作为强种强国和培育、弘扬尚武精神的重要手段出场。其背后的“理性狡计”就是:强国必要强种,强种必要习武,习武必要塑造具有尚武精神的现代化人格。这些思想光芒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在场的必要性。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局部的战争和各种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如俄乌战争、各种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之时,应对和处理这些复杂的国际变局、不安定因素和严峻的风险挑战,都需要强大的中华民族尚武精神在场。新时代尚武精神既要有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警惕和防范发展中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也要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和胆气以及战略思维的自觉和睿智,应对和处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才能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育和武术就是培育和弘扬新时代尚武精神的有力抓手。

参考文献:

- [1] 姜萌.试析1903—1911年间中国的尚武思潮[J].东岳论丛,2004(2):121-125.
- [2] I.H. 武化运动[J].努力周报,1922(9):17.
- [3] 张浦泉.中华武术会开会记——张浦泉提倡“新武化”[N].时报,1922.
- [4] 张富岁.兵士教育化[J].独立评论,1936(10):4.
- [5] 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 [6] 曾琦.弁言·学校军事教学问题号·醒狮[N].1925.
- [7] 李璜.军事教育的精神——学生日常生活与军国民精神[J].晨报副刊,1925.
- [8] 鲁继曾.新武化运动[N].长虹·创刊号,1925.
- [9] 黄克利.论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J].大学教育,2014(1):25-27.
- [10] 曹关群.鲑鱼之宴——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学校国防教育管窥[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1):154.
- [11] 徐正榜,陈协强.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 [12] 丘汉兴.新武化运动发端(二)[N].晨报副刊·新少年旬刊,1925.
- [13] 郝更生,侯绍文.两年来之中国体育[J].中国新论,1937(3):273.
- [14] 程登科.怎样利用军警权利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化[J].体育季刊,1935,1(2):179-187.
- [15] 萧忠国.战时国民体育[J].国民体育季刊,1941,1(1):32-38.
- [16] 崔乐泉,郭荣娟.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J].体育学研究,2019,2(2):15-22.
- [17] 刘帅兵,支川.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武术工作机制及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1,35(3):83-91.
- [18] 张之江.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北京:中国书店,2008.
- [19]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第17辑)[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 [20] 张之江.国术家要术学并重[J].国术周刊(南京),1934(128):1-2.
- [21] 张之江.敬劝同胞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书[J].南京国术周刊,1932(10):84.
- [22] 万籁声.“武化运动”与“中国武术”[J].晨报副刊·新少年旬刊,1925.
- [23] 精武体育会史料选[J].档案与史学,1998(1):16-22.
- [24] 伊见思.体育研究社略史·体育丛刊[J].1924(11):314-315.
- [25] 王华倬.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26] 伊见思.体育研究社十三年来社务经过[J].体育丛刊,1924(11):315-327.
- [27]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批第一七四号[N].国民政府公报,1928.

- [28] 周伟良. 简论张之江先生的国术技击观[J]. 中华武术(研究), 2017, 6(3): 8.
- [29] 张之江. 张之江先生言论集[M]. 南京: 大陆印书馆, 1931.
- [3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31] 东海兵魂录[N]. 安徽俗话报, 1904.
- [32] 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 1917, (3)2: 57.
- [33] 严复文选(注释本)[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34] 梁启超. 论尚武[N]. 新民丛报, 1903.
- [35] 孙文. 精武本纪序[J]. 体育文史, 1983(1): 35.
- [36] 戴旭. 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 [37] 新形势下强军兴军的科学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 求是, 2014(23): 24-27.
- [3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中国老区建设, 2021(8): 4-8.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N]. 人民日报, 2022-04-22(10).
- [4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 (2019-09-02) [2022-04-24]. http://www.gov.cn/j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作者贡献声明:

李龙: 提出论文选题, 确定研究方案, 撰写、修订论文; 侯文韬: 搜集、整理文献资料; 刘帅兵: 修改论文, 核实文献。

The Content and Logic of Wushu Advocacy Mo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he New Era

LI Long¹, HOU Wentao², LIU Shuaibing¹

(1. School of wushu and Arts,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2. School of P. 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Being relative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Wushu Advocacy Movement was intended to find a way out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 which the thought still remains relevant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ent and logic of the Wushu Advocacy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Wushu Advocacy Movement cultivated and promoted the martial spirit mainly by transforming the military group, devising military education, sports education as well as Wushu education to ensure national survival. The logic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is in response to the external factors, and to build a strong nation and people is the internal positive logic. The internal logic of its promotion of Wushu is that a strong country must have strong people who must practice Wushu, and practicing Wushu must create a modern personality with martial spirit. These thoughts become relevant in the new era with regard to building a modern army, cultivating young people's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and responsibility, and enhancing value recognition 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physical fitness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Sports and Wushu culture.

Key words: Wushu Advocacy Movement; sports education devised for national survival; save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strong people and strong nation; martial spirit